

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新趋势

徐以骅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增长。大规模宗教复兴不仅发生于传统世界性宗教（如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也发生于传统地方性、非建制性、民间性和新兴宗教（如印度教、巴哈伊教等）。全球化和网络媒体进一步造成和加剧了宗教基要主义、政治伊斯兰、种族/宗教散居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恐怖主义、宗教人权运动等跨国宗教运动和现象。在这些宗教运动和现象中，国际传教运动的突飞猛进尤为引人注目，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宗教布局，而且对人们关于传教运动的传统看法和理论范式形成具有颠覆性的挑战。本文主要针对当前国际传教运动的发展趋势和国内学界对传教运动尤其是基督教传教运动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实现以下“四个跨越”的研究设想，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从研究基督教传教运动历史到传教运动现状的“旧与新”之间的跨越

就国内学界而言，对基督教传教运动的研究重历史轻现状的现象十分严重，而且两者基本上处于割裂状况，因此国内的传教史研究往往缺乏对现状的关照，尽管目前国内宗教学者如卓新平教授对当代基督宗教的发展已有较为系统的研究。¹

从全球范围来看，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宗教复兴造成了基督宗教传教运动从全球处境、运动方向到传教战略等方面的巨大变化。²用美国著名福音派牧师华理克（Rick Warren）的话来说，就基督宗教而言“在过去 50 年里人们见到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宗教重新分布”，而基督宗教的未来在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³基督教传教运动不仅一举摆脱二次大战以来的颓势，迎来了继传教运动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所说“伟大世纪”（19 世纪）后的所谓的“更伟大世纪”或“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在基督徒人口分布上发生了重心向全球南部的结构性转移，在差会背景上发生了从传统/老线差会向福音/新兴差会的方向性转移，在传教领导权上发生了从外国差会到本地独立差会的战略性转移。⁴20 世纪末一位典型的基督徒已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洲妇女；⁵更

¹ 其中尤值得重视的是卓新平所著《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该书 2007 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以及《“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该书 2008 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另可参涂怡超：《现代福音派国际网络的形成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四辑上），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第 234-263 页；涂怡超：《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² 从宣教学观点看待当代传教运动发展趋势的著作可参 Michael Pocock, Cailkyn Van Rhee and Douglas McConnell, *The Changing Face of World Missions: Engaging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Trends*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05).

³ 华理克称在 1900 年，全世界 71% 的基督徒居住在欧洲，而到 2000 年，这一比例降至 28%，而实际上教堂的基督徒的比例还低的多（类似的数据经常出现在西方教会以及学术性出版物上）。“The Future with Evangelicals: A Conversation with Pastor Rick Warren, Friday, November 13, 2009,” <http://perforum.org/events/?EvantID=221>

⁴ 可参徐以骅：《美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史述评》，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美

多是生活在社会边缘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穷人，而不是来自全球北方富庶国家的中产和富裕阶层；而 21 世纪初一位典型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已非男性白人，而更可能是女性或其他种族。⁶“第三教会崛起”、“传教士肤色改变”、“反(逆)向传教”、“移民教会”、“世界基督教”、“全球基督教”、“基督教王国”⁷等，也正在成为“基督教的新面孔”和“世界宣教大变脸”的基本内容，⁸作为传教中心“波士顿和纳什维尔正在让位于汉城（现称首尔）和内罗毕”⁹。事实上就所派遣的海外基督教传教士的人数而言，韩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¹⁰

20 世纪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大变局还包括五旬节派的崛起。五旬节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内积蓄力量，以其本土化、自发性、包容性、草根性、跨国性、多中心为特点的发展路线一举成为当前基督宗教的第三支力量，¹¹在世界范围促进了基督教根基跨文化转移的“文化革命”，其在全球范围信徒人数据估计至少在 2 亿以上。五旬节派在除了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之外的所有地区都获得了规模空前

国宗教的“路线图”》（第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第 320-350 页。

⁵ 转引自 Dana L. Robert, “Shifting Southward: Global Christianity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29, no. 2 (April 2000), p. 50.

⁶ 其中女性传教士的增加率要远高于男性传教士的增长率，可参涂怡超：《基督教福音派海外传教运动与当代国际关系》，载徐以骅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9 年，第 32 页。

⁷ 目前学界尤其是传教学界世界范围基督宗教的基本上有以下三种“专业表述”：“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世界基督教”（world Christianity）以及“全球基督教”（Global Christianity）。其中反映植根于地缘政治和经济权势的基督教信仰国际性、基督教差传与西方地缘政治权势扩张千丝万缕关系以及西方对基督教的支配的“基督教王国”模式或称呼显然已经落伍。而出现在一次大战后的“世界基督教”和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全球基督教”两种提法其实大同小异，均被用来描述基督教跨国现象或基督教世界范围基督教信仰的各种形式的文化表述，强调的是文化和神学而非政治面向，以及世界各地基督教文化的互动、扩张、借鉴、综合和变革等。关于三种表述的讨论可见 Todd M. Johnson and Sandra S. Kim, “Describing the Worldwide Christian Phenomeno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29, no. 2 (April 2005), pp. 80-84.

⁸ 可参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该书有台湾立绪文化题为《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的中译本；Philip Jenkins, *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 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基督教人口重心南移，但神学、机构、经济资源的重点仍在“全球北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宗教学者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教授在考察了关于“新传教运动”的所有主要文献资料后认为，基督教传教运动的格局并无重大改观，美国基督教会提供传教人员、资金和人道主义援助方案上在世界范围内不仅独占鳌头，而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积极。引自作者在 2008 年 2 月间所做伍斯诺教授演讲记录。伍斯诺教授的观点可说是对基督教“传教中心南移论”的颠覆，详情可参其新著 *Boundless Faith: the Global Outreach of American Church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⁹ Dana L. Robert, “From Mission to Mission to Beyond Miss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Protestant Foreign Mission since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Oct. 1994), p. 156.

¹⁰ 韩国世界宣教协商会（KWMA）称，截至 2007 年年底，韩国 560 个教会团体派遣的 1.6616 万基督教传教士到世界 173 个国家和地区宣教，规模仅次于美国。而就基督教徒的宣教热情、志愿和牺牲精神而言，韩国堪称世界第一。引自苏恩仙：《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对韩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以阿富汗人质危机为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09 年硕士论文，第 10 页。

¹¹ 即次于天主教和基督教但超越东正教和圣公会的第三支力量。

的增长,如在拉美,新教各宗派尤其是五旬节派的增长正在挑战拉美社会天主教会认同的长达五个世纪的历史。¹² 照英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戴维·马丁(David Martin)的说法,具有自发性的五旬节派的崛起甚至“标志着传教时代的终结,而不是新篇章的开始”。¹³ 当然也有学者对“未加思考地使用‘五旬节派’称呼来概括正在增长的世界基督教”这种做法持有异议。¹⁴

基督宗教在历史上发生过多中心衰落和迁移。也许目前断言 20 世纪是白人主导基督宗教的最后一个世纪还为时尚早,所谓逆(反)向传教(即亚、非、拉传统被传教国向欧、美老牌基督宗教国家传教,或全球南部的基督徒把全球北部国家作为传教地)亦尚未完全形成气候,¹⁵但上述基督宗教新传教运动或传教运动新局面确实颠覆了关于传教运动和传教士的传统形象,对人们理解传教运动的性质、趋势及其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基督宗教的重心南移,更具体地就是天主教会重心从欧洲向拉丁美洲的转移及基督教会重心从美、欧洲向非、亚洲的转移,“基督宗教作为欧洲殖民压迫者宗教的年代正在更迅速地成为与我们渐行渐远的过去”。¹⁶全球基督徒也越来越具有所谓宗教迫害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端的所谓国际或全球宗教自由运动的发展。¹⁷ 如果说,昔日“每位帝国赌博的

¹² 关于五旬节派在拉美尤其在南美和中美洲的发展,可参 Ted Gerard Jelen and Clyde Wilcox,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One, the Few, and the Many*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ters 9 and 10.

¹³ David Martin, “Another Ki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此文撰于 2008 年,未正式发表,第 5 页。译文题为《另一类文化革命?——作为基督宗教第三支重要力量的五旬节派》,载于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 142-163 页。事实上马丁教授对五旬节派的评估比此前已有所调整。在其 2002 年发表的著作中,他曾称五旬节派在基督宗教中是仅次于天主教的第二支重要力量,全世界 20 亿基督宗教徒 8 人中就有 1 人(约 2 亿 5 千万)是五旬节派信徒。见 David Martin, *Pentecostalism: The World Their Parish* (Oxford: Blackwell, 2002), p. 1.

¹⁴ “Shifting Southward: Global Christianity Since 1945,” p. 57.

¹⁵ 与詹金斯(Philip Jenkins)等比较乐观的意见相反,逆(反)向传教在老牌基督宗教国家发展缓慢。如在英国,非西方教会的传教对象仍为本国或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居民,与所谓移民教会有很大的重叠,其传教障碍包括:当地社会的歧视和偏见、文化背景的差异、非西方教会本身在来源、种族、教派、神学等方面的多样化,以及缺乏必要的经济力量。可参孙艳燕:《当代英国宣教状况概览》,载徐以骅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第 99-141 页。

¹⁶ “Shifting Southward: Global Christianity Since 1945,” p. 56.

¹⁷ 关于所谓全球宗教自由问题过去一直没有量化的指标。根据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the Pe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2009 年 12 月 16 日发布的对 198 个国家和地区在 2006 年到 2008 年间的情况所作的研究报告,世界上有 32%国家和地区(64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近 70%的人口处于对宗教的高度(严重)或非常高度(严重)的限制之中。该研究报告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对宗教的限制分为政府(横轴)和社会限制(纵轴)两大类,在程度上又分为高度(严重)、非常高度(严重)、温和、低度等级别,结果就某些国家的宗教受限度而言,可以出现政府较高度限制,社会较低度限制或社会较高度限制、政府较低度限制等多种情形。不过该报告也承认,其局限性在于只是处理宗教受限的一面,而未及宗教开放、多元和富有生机的一面。此外,该研究报告所依据的主要为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欧盟理事会、英国外交部、人权观察、国际危机集团、赫德逊研究所和大赦国际等西方组织机构提供的资料,其公信力受到影响。此外,此研究报告虽表明西方主流学界对非西方国家宗教状况的认识有所深化,从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来看待宗教自由问题,但并未深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

新玩家都谋求以传教活动的辞令来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¹⁸那么今天的西方政治和宗教势力则通过“宗教自由”和“宗教人权”议题来介入国际事务和他国内政。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教会史取代宣教史，研究世界宣教取代研究海外宣教，新宣教学取代老宣教学而成为学术研究主流，基督教传教运动已由宗派性差传让位于普世合一性差传再过渡到对差传的超越，从过去单一性解释过渡到现在的去中心和多元化的解释。¹⁹抱残守缺地坚持传统的“中心-边缘”、“差会-工场”、“西教东渐”、“基督教扩张史”、“被传教受支配”的研究范式，不仅根本不能正确反映当前传教运动的现实处境，也无法充分解释传教运动的历史发展趋势。就中国基督教史而言，中国教会固然不能因“控诉运动”等的“彻底清算”而成为“无根”的教会，²⁰也不能因缺乏对当代全球基督教布局和传教运动发展趋势的关照而成为“例外”的教会。

二、从研究传教运动到国际关系的“圣与俗”之间的跨越²¹

美国著名宣教史学者比弗（R. Pierce Beaver）曾这样评论说，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很久，海外宣教仍然是“美国花费最大且最为持续的对其他民族的善心和利他主义的表示，是美国文化在草根层面对这些民族产生影响的最有效的方式，是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美国大众形象的塑造者。此后它继续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²²在上世纪 90 年代，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教授、“基督宗教重心南移论”的主要学者达纳·L. 罗伯特（Dana L. Robert）亦指出：“差传事业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在于国际关系领域”。²³然而，除了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美关系史及东亚国际关系史等少数领域外，²⁴即使在西方学界，对传教运动与各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的关系的研究仍似“两股道上跑的车”，极少有交集与会合，尽管宣教学/宗教学与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分别都是中西学界得到最多关注的一些研究领域。因此，国际关系学应成为一个“传教区”，或者说宣教学也应被纳入国际关系学的“势力范围”。²⁵

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同时出现政府高度限制而社会低度限制宗教的状况。可参“Global Restrictions on Religion,” Dec. 2009, <http://pewforum.org.docs/?DocID=491>

¹⁸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p. 35.

¹⁹ 可参上引 Dana L. Robert, “From Mission to Mission to Beyond Miss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Protestant Foreign Mission since World War II.”

²⁰ “无根”的说法参照邢福增教授《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的《自序》，该书 2008 年由香港道风书社出版。

²¹ 此处跨越“圣与俗”的说法参照 Andrew Presto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0, no. 5 (November 2006).

²² R. Pierce Beaver, “Missionary Motivation through Three Centuries,” in J. C. Brauer, ed., *Reinterpretation in American Church History*, vol. 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 113.

²³ “From Mission to Mission to Beyond Miss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Protestant Foreign Mission since World War II,” p. 156.

²⁴ 可参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 20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王立新：《美国在华传教运动与中美关系：一个初步的阐释框架》，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社会》（第二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第 299-320 页。翻译著作有李本京主编：《美国基督教会对于东亚之影响》，台北：正中书局 1991 年。

²⁵ 这里借用了宣教学者沃尔斯 (Andrew F. Walls) 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宣教学要与学术界更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宗教全球复兴²⁶正在改变上述“圣与俗”研究分离的状况。各大宗教的全球性扩张及其所引起的国际社会的大规模“认同变迁”和冲突碰撞,正在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传教运动研究也开始走出宣教学和教会史的“隔都”,与外交和国际关系等所谓主流学术领域的学者展开越来越频繁的对话。鉴于传教运动对当前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涂怡超博士把基督教传教运动称为 21 世纪国际关系中的“革命引信”和“国际关系宗教回归”的重要因素,认为传教运动在使宗教问题国际化、造成基督教会与民族国家和其他不同宗教/民族之间以及基督教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对抗等方面有直接作用,并且成为影响西方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因素。²⁷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和宗教学教授、《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的作者詹金斯(Philip Jenkins)所言,传教和宗教移民运动不仅引起了全球宗教的大变局,而且还可能造成全球政治的大变局。他指出目前在全世界 25 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至少有 10 个出现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严重对立的状况,因此这些国家均有可能成为“严重宗教冲突的舞台”。²⁸当前被“普世 2000 年福音运动”(the AD 2000 & Beyond Movement)组织和参与者鼓吹为全球基督教传教重点即多半为“福音未及之地”和“未得之民”的所谓北纬 10 至 40 度之窗(the “10/40 Window”),²⁹或目前由华人主导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所覆盖的从东亚/东南亚经中东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就与从北非、中东到南亚的所谓伊斯兰弧形地带或极端主义弧形地带多有交叉重叠,成为宗教冲突的高危地区。此外,基督教传教运动过去和现在都对传教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³⁰2007 年“阿富汗人质危机”引起韩国社会与教会以及教会内部的对立冲突就是晚近的例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等宗教行为体一样,世界性传教运动在跨越地区、种族、肤色和文化界限,以及在促进经济赋能、社会改良、认知解放、政治民主、信仰自由、跨国救援、国际交流、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等方面,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起十分积极的作用。

紧密结合并使之也成为“宣教区”。见 Andrew F. Walls, “Structural Problems in Miss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October 1991), p. 150.

²⁶ 斯科特·M. 托马斯(Scott M. Thomas)对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全球宗教复兴”(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概念作了以下界定:“全球宗教复兴指宗教日益具有显要性和说服力,如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日见重要的宗教信仰、实践和话语,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人物、非国家团体、政党、社区和组织在国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这一复兴正以对国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方式发生。”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26.

²⁷ 上引涂怡超:《基督教福音派海外传教运动与当代国际关系》,第 16-53 页。

²⁸ 见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pp. 166-167.

²⁹ 关于“普世 2000 年福音运动”的主要目标以及关于所谓北纬 10 至 40 度之窗这一矩形地带究竟涵盖多少国家、有多少人口、基督宗教徒或福音派在这些人口中所占比例为多少才称得上“福音未及之地”或“最少福音化之地”,普世 2000 年福音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对该运动的评估可参 Robert T. Coote, “‘AD 2000’ and the ‘10/40 Window’: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Oct. 2000), pp. 160-166; 以及 Window International Network 网站: <http://www.win1040.com/>

³⁰ 这方面晚近的研究可参 Daniel H. Bays and Grant Wacker, eds., *The Foreign Missionary Enterprise at Home: Explorations in North American Culture History* (Tuscaloosa,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3).

历史上基督宗教在华的各种差会和华人宣教会，并未因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完全销声匿迹，而是大部撤至港台、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区，这便大大拓宽了“对华宣教”和“在华宣教”的范围，使之成为在一次与二次大战期间基督教传教运动国际化的后续发展。³¹如金陵神学院的创办人部（业董部）和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等机构就把在华办理教会教育和神学教育的目标，转移到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乃是旨在“传道于天下”（evangelizing the world）的国际传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³²对受派遣差会调度而事奉于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来说，在华宣教并不一定就是其传教生涯的起点或终点。因此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不仅需要沟通“对华宣教”与“对中国文化圈宣教”，而且需要串联“对华宣教”与“普世宣教”，使其具有更宽阔的视野，事实上尽管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对华宣教”的后续发展，如对在华差会和传教士撤离中国及反思经验教训的研究，³³但对在华差会和华人教会 1949 年后在海外的跨地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演化和发展，以及对同一时期在华宣教与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宣教的比较研究，学界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³⁴因此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当代化和国际化具有较大的空间，尤其在备受海外宗教媒体关注的华人“回宣”领域。³⁵

三、从研究基督教传教运动到其他宗教传教运动的“教与教”之间的跨越

全球宗教复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传教运动的复兴和持续发展，西方主导宗教（基督宗教、摩门教等）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巴哈伊教、印度教、道教、若干新兴宗教等）的北上互相交叉，使宗教进一步成为跨国流动现象，并改写和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到本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宗教获得了比基督宗教更快的发展以及比基督教新教任何一个宗派更广的分布。³⁶在欧洲，伊斯兰教和佛教在

³¹关于一次大战与二次大战间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国际化或第一波全球化，可参 Dana L. Robert, “The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nalization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April 2002), pp. 50-64.

³²可参 Terrill E. Lutz, “The SVM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in Daniel H. Bays and Ellen Widmer, eds.,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Transpacific Connections, 1900-195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19;

³³可参上引《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第四章。

³⁴裴士单（Daniel H. Bays）和魏爱莲（Ellen Widmer）在由他们主编的上述关于在华教会大学史的新著中，就加入了同时期关于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和土耳其的个案研究，并指明比较中外传教事业的研究方向。见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Transpacific Connections, 1900-1950*, pp. 267-269.

³⁵关于“回宣”即向穆斯林传福音（广义）或“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狭义）的历史和现状可参黄剑波：《自西向东：西北灵工团史述及思考》，载李金强、吴梓明、邢福增主编：《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第 239-256 页；Kim-Kwong Chan, “Mission Movement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Mainland China: The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to be published (2009). 国内关于当代华人教会海外传教活动的个案研究另可参张广永：《“华福”与新传教运动》，载徐以骅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 199-226 页。

³⁶如伊斯兰教分布于全世界 204 个国家和地区、巴哈伊教分布于 218 个国家和地区、犹太教分布于 134 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分布于 126 个国家和地区等。David Barrett, George T.

许多国家已成为继基督教或天主教后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取得了与这些宗教在世界其余地区的存在和发展比较相称的地位。在中国和整个华语世界,尽管基督教在 19 世纪首先开创了大规模慈善活动的先例,但正如波士顿大学魏乐博 (Robert Weller) 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却是佛教在开展慈善活动和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³⁷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一般关注基督宗教的传教运动尤其是其在华历史,在该领域尤其在基督教高等教育史等方面几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实现了“研究的中国化”³⁸或已进入“学术进展主要发生在中国的第三阶段”,³⁹相比之下因各种原因国内学者对其他宗教传教运动的研究就相当有限,⁴⁰对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巴哈伊教、印度教等东方主导宗教的“北上”的研究有待深入,而对“海纳百教”、“无拘无束”、“多元多源”且曾经或正在风靡西方社会的各种新兴宗教/信仰运动如新时代运动⁴¹也缺少探讨,传教史实际上几乎成了基督宗教传播史的另一名称。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有具有自身特点的传教方式和路线,而宗教传播引起的各宗教间的包括相互借鉴和碰撞的互动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关系。此外,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传教(或称福传、拓展、拓荒、外展、弘法、弘道、度人等)运动既不依附国家也不借助国力,其中许多宗教在所在国还处于少数派宗教甚至受压迫宗教的地位,并且与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极端主义均无瓜葛,这在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之外的

Kurian, and Todd Johnson, eds.,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2nd ed., vol. 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³⁷ 可参魏乐博 (Robert Weller) 著、汪昱廷译:《中国社会的宗教和公益》,提交“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多元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 2009 年 7 月)论文。另参魏乐博、汪昱廷:《中国社会的宗教与公益》,《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7 期)。

³⁸ Jessie G. Lutz, “The Sinification of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lleges,” in Peter Chen-main Wang, ed., *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 Evaluation in Modern Perspective* (Sankt Augustin, Germany: Institute of Monumenta Serica, 2007), pp. 119-149. 在该文中鲁珍晞教授指出,在华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主要可分以下四个阶段,即(1)宣教史,1925 年至 1950 年代;(2)挑战和反应的历史,1960 年至 1970 年代;(3)以中国历史处境来考察教会大学,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以及(4)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1980 年代以来。鲁珍晞教授认为,在目前这第四阶段教会大学的研究正在更迅速地实现西方学者向中国学者交棒。

³⁹ 裴士单和魏爱莲教授在上引书中指出,在华教会大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二个阶段主要成果分别为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和 60 年代初由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出面组织的关于在华教会大学“有怀旧色调”的颂扬性系列著作的出版,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鲁珍晞教授《中国与教会大学:1850-1950》(*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以及菲利普·韦斯特 (Philip West) 教授《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 年》(*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这两部开创性著作的问世。第三阶段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见“Preface: This Volume in the Context of Evolving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in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Transpacific Connections, 1900-1950*, pp. 303-307.

⁴⁰ 此类著作有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安娜·塞德尔著、刘凌译:《西方道教研究史》第八章《中国之外的道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⁴¹ 关于新时代运动可参潘天舒:《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美国“新时代运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四辑下),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第 577-589 页;罗伟虹:《美国的新时代和新宗教运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第 238-254 页。

宗教尤为如此。

四、从研究传统传教到网络传教的“实与虚”之间的跨越

如果说全球化助推了宗教的跨国流动，那么互联网则造成自宗教改革时期以来媒体与宗教的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结合，故网络宗教（或称“电脑宗教”、“虚拟宗教”）⁴²所带来的变革甚至有“第二次宗教改革”之称。照美国联合卫理公会的著名牧师迈克尔·斯劳特（Michael Slaughter）的话来说：“电子媒体之于 21 世纪的宗教改革有如谷登堡的活字印刷之于 16 和 17 世纪的宗教改革。”⁴³网络对各种宗教的传播都有“放大效应”，大大提高了民众参与宗教活动的数量，⁴⁴成为“上帝的麦克风”。由于网络相对较低的进入门槛，边缘宗教团体和信仰获得比以往更大的“曝光度”和“发言权”，这便为新兴和弱势宗教或信仰团体提供了极大发展空间，并且对传统建制教会形成冲击。网络“世界性”与宗教“普世性”的契合，也使网络宗教具有比以往任何传教方式更有力的穿越疆域国界的能力。事实上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至少在虚拟空间上任何地方性宗教都有可能成为具有全球性的宗教。目前，网络宗教作为新型传教方式还只是传统宗教活动的一种重要补充，尚不能完全取代实体型传教组织的作用，但其无论作为新型传教主体（电脑空间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yberspace）还是作为传统传教组织的新型工具（电脑空间上的宗教，religion on cyberspace）在当代传教运动中都已显示出巨大的潜力。⁴⁵

与继纸面（平面）传媒出现的其他新型媒体如广播和电视不同，网络媒体具有“三最”（最快、最广、最直接）、“三无”（无法律、无国界、无法管制）以及低门槛、低成本、即时性等革命性特征，这在提升宗教组织直接传教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它们基层动员、影响政治议程和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可使世界各地的任何宗教问题迅速透明化、国际性和政治化。网络的无国界性有助于塑造超宗派、跨国界的社会组织认同，这是宗教参与全球议程、形成全球动员的前提条件。网络宗教的开放性、虚拟性、跨国性和渗透性也使我国现行的把宗教活动和出版物限于有形空间和实体形式的大部分宗教法律、法规处于滞后状态，并且对我国政府的宗教以及网络管理工作都形成挑战。⁴⁶

就目前中国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宣教学研究不仅主要限于国内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历史，而且主要基于历史学科，间或也借助神/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进路。

⁴² 费利克斯·威尔弗雷德（Felix Wilfred）：《信息社会的宗教与神学》，载《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 83 页。

⁴³ 引自 Norman E. Thomas, “Radical Mission in a Post-9/11 World: Creative Dissonances,”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Jan. 2005), p. 4.

⁴⁴ 关于宗教互联网是使民众远离上帝还是接近上帝、疏离教会还是走近教会的讨论，可参谢洁、黄平：《网络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兼论美国宗教的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第 409-421 页。

⁴⁵ 照威尔弗雷德教授的说法，因特网具有创造和生成功能，可在线生成种种宗教内容和行为。因此“电脑空间中的宗教”指“只出现在电脑空间的宗教”；而“电脑空间上的宗教”则指“任何宗教、教堂、个人和组织在网上上传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业存在于非网络世界，并可以在网络以外的世界里获得”。见上引文，第 92-93 页。关于网络宗教及其网络宗教对传教运动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可参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网络时代的宗教》（第三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5 年。

⁴⁶ 可参谢洁、黄平：《网络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第 427-432 页。

而当前国际传教运动的多元发展，则要求研究者更加具有“国际视野”和“当代关怀”，传教运动研究在学科上也需走出传统宣教学的“隔都”而与国际关系、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作更紧密的结合。总之，鉴于当代传教运动国际化、政治化、多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拓宽传教运动研究的时空范围，加强对当代包括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各宗教的传教活动以及以互联网为媒介或基础的新传教方式的研究，即实现上述“四个跨越”，是对国际传教运动的更加全面的学术回应。

*本文曾发表于《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本次发表内容有较多增补。